



王洲明 著

先秦两汉文化与文学

山东大学出版社

先秦两汉文化与文学

王洲明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特约编辑：刘继儒

责任编辑：周广璜

责任校对：黄金莲

版式设计：赵 岩

先秦两汉文化与文学

王洲明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大学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 12.25 印张 320 千字

1996 年 5 月第 1 版 199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7-5607-1661-X
I·121 定价：13.80 元

自序

1993年8月,首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石家庄召开,中国诗经学会会长河北师院夏传才教授,为推动《诗经》学术研究,倡议出版一套《诗经文库》,并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响应。由于教学和科研的需要,我曾经就先秦哲学与先秦文学的关系作过一些思考,有一些很不成熟的看法,现在有了这个机会,当然十分高兴。于是就决定以先秦文化作大背景,追根溯源从根本上来研究《诗经》内容和形式上的诸多特点,并拟定了写作的题目。夏先生对我的计划非常支持,并给予热情鼓励。至今两年多的时间过去了,于是就有了本书中的《周代礼乐文化与〈诗经〉品格》的部分。

《先秦两汉文化与文学综论》部分,内容就宽泛多了,但又都是从大文化背景出发,来研讨先秦两汉文学发展的轨迹。

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期的文学,一个具体作家的文学创作,一个作家的某篇具体作品,都是一个具有独特个性的“信息库”,又同时都是一个复杂而又有机联系着的整体。“文学即人学”的观点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于是就演绎出“文学史即作家心灵史”的论点。这无疑是对文学作庸俗社会学评判的纠偏,是一种正

确的认识。但是,任何作家又都属于一定的社会历史,任何作家的“心灵”都是在一定社会历史的背景上产生的,其表露也必须受到一定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单纯强调“心灵史”,同样不能全面正确阐释文学运动过程。任何文学运动都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因此,对文学运动的研究也应该而且必须兼及“共性”和“个性”两个方面。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始终把研究的对象当做一个“有机连系过程”来看待,而它们与文化的连系,就是这种“有机连系过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我感到,作“心灵史”式的考察,较便于把握文学细部的问题;着眼于与大文化背景关系的考察,较易于作宏观的把握和得出某些本质性的认识,二者都是不可或缺的。

据有人统计,世界上关于“文化”的定义约有二十余种,我比较地同意庞朴先生关于“文化”概念的一些论述,他在《文化概念及其他》一文中指出:“文化是人的本质的展现和成因,就是说它是人的本质的展开的表现和人的本质的形成的原因。具体说人通过劳动使自己主体的意识客体化为一些对象,也是通过劳动使客观的物质符合自己的主观要求。这样,创造出一些东西来,创造出一些方式来,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在这样创造过程中,也就把人自己塑造成为一个文化的人。”他又把文化分作三个层次:“就是说物的层次(物质的层次),心的层次(或叫心理的层次),中间是心和物相结合的层次。”心和物相结合的层次包括的面很广,诸如文学、科学、教育、哲学、宗教、神话以及制度等等;而心的层次,则是“纯粹心的部分,或者心理的部分了。那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道德情操、宗教感情、民族心理或叫民族性格等等这些东西”。(载《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很长时间以来,我们思考文学艺术发展的原因,比较多地注意到了经济和政治的因素,至于哲学的、宗教的、心理的等方面的因素则注意得不够。近来人们比较多地注意到这方面的问题,这是很好的现象。也确实给我们提供

了许多新的启示。在本书中，我探索了周代礼乐文化与《诗经》的关系；探索了南北不同文化系统所产生的《诗》《骚》艺术表现上的不同；探索了汉代经学与汉代文学、文学理论发展关系的一些问题；探索了汉代齐学与汉代文学的关系问题；也从文化和文化思潮的角度对具体作家的荀卿、贾谊作了一些探索。我力图把研究文学与文化的关系作为切入点，从本质上认识先秦两汉文学发展的某些规律性问题。

近些年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和其它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一样，讨论如何从事研究的方法论，是非常重要的话题。而且的确有一些学者捷足先登，作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应该说我也注意并关心到这方面的问题。但我自己所做的、包括这本书中的成果，都是用所谓传统的研究方法写作的。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自己已经习惯于传统的研究方法，也主要是因为传统的研究方法至今仍然具有着其它研究方法无可取代的优越性。我常想，我们从事一个课题的研究，就像是开发一座矿藏，不摸清这矿藏的全部底细，怎么能将其中的宝藏开发得好呢？传统的研究方法从掌握研究资料入手，正是摸清矿藏全部底细的做法。当然，重视资料、从掌握资料入手，并不是也不应该忽视理论的审视和把握，轻视理论同样是错误的。掌握资料是我们理论审视和把握的基础，而理论的审视和把握就是要透过错综复杂的联系，把握事物的本质，总结出某一些文学历史运动的规律或说明一种文学现象。人们常常区分的所谓“宏观的研究”和“微观的研究”，其实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只是各有所侧重而已。读者从这本书里可能会发现我的这种努力。

古人曾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但我更希望这本《先秦两汉文化与文学》能为读者所知，这其中当然应该包括批评在内。

还应该说明的是，书中的《周代礼乐文化与〈诗经〉品格》部分，是《诗经文库》的一部专书，由于多方面原因，《文库》推迟出版。

但我对主持《文库》出版事宜的夏传才教授仍十分感激，如果没有他的期望和督促，说不定书中的许多观点至今还只是一些想法而已。

山东大学文科办公室和山东大学出版社的同志为该书的出版提供了许多帮助，陈启智先生为该书题写了书名，在此一一表示谢忱。

读硕士时，我受学于萧涤非和董治安先生。回想起先生的教导以及与同窗好友们的切磋琢磨，“于我心有戚戚焉”。如今，萧师已经仙逝，每忆及先生的音容笑貌，又不禁怆然伤感。我只有更加倍努力，来回报师友的教育与期望。

一九九六年元旦，记于

山东大学寓所

目 录

自 序

周代礼乐文化与《诗经》品格

中国早期认识论与《诗经》的特点·····	(3)
周代礼乐文化与《诗经》(上)·····	(23)
周代礼乐文化与《诗经》(下)·····	(47)
周代宗法制度与《诗经》·····	(66)
周代“敬德”思想与《诗经》·····	(77)
周代的伦理道德与《诗经》·····	(91)
周代士人忧患意识与《诗经》的讽刺诗·····	(105)
周代地域文化与《国风》的风格·····	(116)
论《诗经》比兴手法兼及诗歌意境的起源·····	(130)
论《诗》《骚》艺术空间观念的不同·····	(138)
《楚辞》对《诗经》抒情方式的突破·····	(149)
论郑玄《诗谱》的贡献·····	(158)
论郑玄对我国古代文论的贡献·····	(177)
汉代《诗》经化过程中的复杂现象·····	(190)
汉代《齐诗》传授的特点·····	(205)

先秦两汉文化与文学综论

论屈原的人格·····	(225)
-------------	-------

“庄”“骚”精神异同论·····	(230)
屈原和《楚辞》对汉代文化的影响·····	(235)
从汉代的拟《骚》创作看屈原对汉代文学的影响·····	(248)
论荀子对先秦诸子的批判继承·····	(260)
荀子散文的特点与先秦诸子的关系·····	(270)
论荀卿的《成相》和《赋》篇·····	(278)
论秦汉齐学·····	(285)
齐文学对秦汉文学的影响·····	(298)
《新书》非伪书考·····	(313)
论贾谊的思想·····	(333)
贾谊散文的特点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357)
论贾谊的赋·····	(369)

附

文章正宗与流变·····	(374)
--------------	-------

周代礼乐文化 与《诗经》品格

中国早期认识论与《诗经》 的特点^①

人类社会的认识史证明,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人类有不同的认识水平;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认识特点。

《诗经》是中国一部古老的文学作品,但同时又是两三千年前中国人认识自然和社会的结晶。如果我们能从研究中国人早期认识特点入手,来观照《诗经》的许多特点,这就不仅能真正把握这些特点,而且还能清楚地看到《诗经》表现特点的时代性、民族性,以及这种特点的许多基因被长期延续下来,对于形成和固定中华民族诗学传统,起到重要作用。

认识论的概念非常广泛,既包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包括对主观世界的认识,同时也包括认识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关系。中国早期认识论的内容自然异常丰富,其对包括《诗经》在内的文学创作的影响是异常复杂的。对此作全面细致的总结及说明,确非易事。以下仅就几个重要方面,作些阐述和说明。

^① 本文系为首届《诗经》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供的论文,发表于《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并收入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一)

人类一旦形成,就开始了思维,开始了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中外认识史证明,人类在认识的初期阶段,无论在认识水平和认识特点上,都表现出惊人的相似,就以神话为例,东西方人类的始祖,在很长一段时间,关心的都是自然问题,诸如天地的生成、人的来源、对江河湖海山川四岳雷电日月等的解释,都是那个阶段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重要方面是,东西方的人类,即使在认识的初期阶段,在认识水平、认识特点上表现出惊人相似的同时,也存在不少的差别,特别是伴随历史的前进,由于地理的、气候的、人种的、文化的种种因素的影响,这种认识上的差异,变化得越来越大,以至于形成东西方各自不同的认识史、各自不同的文化系统。

当人类结束蒙昧开始感受文明曙光的时候,东西方的思维和认识就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自然的认识和态度上的不同。一般说,西方早期认识论的特点是崇尚自然,中国早期认识论的特点是崇尚社会。崇尚自然是对自然理性进行思维和探究,对自然现象作出阐释;崇尚社会,则是更加注重人群自身关系的规定调整,更加注重制度、伦理道德。另外,和西方早期崇尚自然的思维特点不同,中国形成了自己的崇顺自然的思维特点,这种崇顺自然其实是崇尚社会特点的又一种具体表现。

古希腊哲学,从时间讲是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6世纪初期,延续了一千多年;从地域讲,它开始于小亚细亚的希腊殖民城市,繁荣于希腊本土,后来移植到亚洲、非洲广大地区。古希腊哲学的内容极其丰富,对于欧洲文明的进步起到重要作用。研究古希腊哲学家特别是早期哲学家的思想,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西方早期认识

论的特点。

早期希腊哲学家们可以分作许多派,比如什么米利都学派、赫拉克里特学派、毕达戈拉斯学派、埃利亚学派、恩培多克勒学派、阿那克萨戈拉学派以及留基波和德谟克利特学派等,他们的哲学主张千差万别,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非常重视对自然界的探究。比如,被称为古希腊第一代自然哲学家的米利都学派,他们一开始就探求宇宙万物的本原,他们把某种有形体的东西如水、无定、气为万物的始点,他们认为自然界的一切东西,都是通过转化从同一本原中派生出来的。比如,赫拉克利特,他是早期希腊最重要的自然哲学家之一,自然辩证法的奠基人,他也非常重视对自然界的探求,他说:“这个万物自同的宇宙不是任何神,也不是任何人所创造的,它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一团永恒的活生生的火,按照一定分寸熄灭。”^① 他曾经写过一本总称为“论自然”的书,三个部分的顺序是:“论万物”、“论政治”、“论灵魂”。他把论万物看作是应该首先探讨的问题。比如,毕达戈拉斯学派,也具有注重研究外界自然的特点,他们研究数目,研究灵魂不死的循环论。“算术家阿波罗多洛说:他(指毕达戈拉斯)举行了一次百牛大祭,以庆贺他发现直角三角形斜边的平方等于两直角边的平方和。有一流传至今的诗句这样说道:毕达拉斯发现了有名的图形,为此操办了遐迹闻名的百牛大祭。”^② 我们没有必要再详细列举古希腊早期哲学家们的许多具体的理论主张了,粗略地看,就十分清楚,他们探求的问题,按今天自然科学的分类,就涉及到天文、地理、数学、生理、物理、化学等许多门类,我们尽管可以指出他们结论的不科学,但无论如何不能否定他们对大自然探究的兴趣和付出的努力。

古希腊哲学家的笔下,还有些很生动形象的记载,对于我们认

① 苗力田主编:《古希腊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7页。

② 同上书,第58页。

识东西方早期认识特点或许更有些帮助。据柏拉图《泰阿德》篇记载：“据说泰利士仰起头来观看星相，却不慎跌落井内，一个美丽温顺的色雷斯侍女嘲笑说，他急于知道高天之上的东西，却忽视了身边脚旁的一切。”^① 如果我们把“身边脚旁的一切”更多地理解为社会和人事，这段话多么形象地反映出古希腊早期哲学家们对于大自然的热烈追求和探求其奥秘的浓厚兴趣。另外，欧台谟在他的《星相史》中记载说：“人们认为泰利士是第一个研究星相的人。他预言了日蚀和冬至夏至。为此，克塞诺芬尼和希罗多德对他表示惊奇，而赫拉克利特和德谟克里特则为他作证明。”^② 这很容易使我们想起《诗经》中关于天象的描写，诸如“嘒彼小星，三五在东”（《召南·小星》）；“绸缪束刍，三星在隅”（《唐风·绸缪》）；“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豳风·七月》）等等。我们注意到，《诗经》中有关天象的描写，都是和人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诗经》中对天象描写的形象生动，莫过于《小雅·大东》：“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有捄天毕，载施之行。维南有箕，载翕其舌；维北有斗，西柄之揭。”这里对银河系星宿的观察和描写，何等仔细和形象！中国远古时代的诗人们和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们，在相差不远的时间里^③，同时面对浩瀚无垠的星空，一个是对它作科学的探究，一个是展开美妙的想象，从而构成形象的比喻，用来揭露和讽刺人世间的的不平等。这多么有趣、又多么形象地说明了中国和西方早期认识论上的差异。

当今研究中西文化的学者，有的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具有“早

① ② 见苗力田主编《古希腊哲学》第17~18页。

③ 《大东》的具体写作时间很难断定。《诗序》曰：“《大东》，刺乱也。东周困于役而伤于财，谭大夫作是诗以告病焉。”今多从《序》说。据考证，谭于鲁庄公十三年（前684）为齐所灭。又，既然是对周王朝不满，按情理当在夷、厉王以后，时当公元前800年左右，而泰利士约为公元前6世纪人。

熟”的特点,比如说,早在公元前的一两千年,古希腊还处于城邦制的时期,中国已经建立起相对高度文明的殷、周王朝,形成一套相对完整的礼乐等级制度。殷商和西周的哲学思想应该是非常发达的,但可惜的是没有一位哲学家作出明确的阐释。殷商和西周发达的哲学发展到春秋和战国,出现了灿若群星的先秦诸子,他们的时代虽然和上述古希腊的哲学家相当,但是,我们又不能只拿诸子和古希腊的早期哲学相比,因为这样做截断了中国哲学的延续性,是一种不公正的做法。中国上古有许多杰出的政治家,如商汤、盘庚、周公等;中国有一部令全世界人眼羡的、充分反映中国人智慧的《周易》,从研究他们认识的一些特点入手,对于了解中国上古思维认识的特点,肯定是有有效的途径。

殷人重鬼重祭,这是我们早就知道的;同时殷人也非常敬祖重天,那冥冥上天,显然就是人格的化身,是天决定万事万物,是天主宰吉凶祸福,祈祷上苍赐予国泰民安。这和古希腊重视外界自然、重视自然科学迥异。商汤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予畏上帝,不敢不正”^①。盘庚说:“先王有服,恪谨天命”,“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断命”^②。至于周公,他是西周王朝的第一位大政治家,他对西周政治制度的建立具有极端重要的作用,他关心最多的是社会、是人事,所以西周初年的许多重大活动他都参与了,这在《尚书》中有非常详细的记载。同样,周公也继承了殷商重天命的思想,遵从天的意志,维护国泰民安,而很少虑及与人对立的外部世界的存在。周公说:“予不敢闭于天降威”,“予造天役,遗大投艰于朕身”,“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尔亦不知天命不易”^③。其它在《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等基本都可以肯定为周公的

① 《尚书·汤誓》。

② 《尚书·盘庚》。

③ 《尚书·大诰》。

文告中,像上述讲天、讲天命的地方还有许多,对有意志的“天”的膜拜淡漠了对自然外界的追求和探索,构成了周人把握外部世界的特点,是非常明显的。

《周易》的古经部分,是我们研究把握西周认识论特点的重要依据。首先,《周易》古经的作者们,注意观察自然现象,正如《易·系辞传下》所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也正如《易·说卦传》所说:“乾为天,坤为地,离为火,坎为水,巽为风,震为雷,艮为山,兑为泽。”笔者对《周易》总共四百五十条筮辞逐一作了检查,其中有不少确实涉及到自然的天、地、物,诸如龙、鹿、猪、虎、羊、鸿、云、雨、雷、杨、茹……等等。而且,近代的许多治《易》专家十分推崇《易经》的朴素自然观:“《周易》很注意对事物的观察、考察,即观物取象的特点”,“这不但使人们知道天地、山泽、动物、植物等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而且经过比较即分析综合的抽象思维,还能够深入把握事物的本质”^①。所有这些情况都符合《周易》古经的实际。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我们必须十分注意到《周易》古经所讲的许多自然现象(当然更多的是社会现象)的目的,不是对自然现象作更多的把握和追究,当然更不是今世谓之的审美的观照,而是通过对自然现象的记述和描写,对要说明的人和事,起一种比附和象征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在春秋时代以前,人们就从《周易》八卦中,约定俗成,形成有固定象征义的人事的内容。李镜池先生从《左传》、《国语》中钩稽出来春秋时期《易经》八卦分别象征的意义是:

乾:天、光、玉、君、天子、父、金。

^① 周向阳、虞文谦:《周易中的朴素自然观》,《周易纵横录》,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9页。